

紅葉集

譚双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260.7

4

1:1

红 叶 初 集

谭双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12月



473134

红 叶 初 集

谭双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三里店)

湖南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43 字数203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ISBN7-5633-0070-8/G·060

统一书号：7502·060 定价：平装2.40元

精装3.40元

序 言

这些议论文字的收集，只是用以表示我的学习过程。

本书收录的十六篇文章，大部分都已公开发表过。其中《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若干观点剖析》二文，虽未见诸刊物，也为196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而被印发了。在编排中，曾想不把《王船山论知与行》和《论王船山的政治革新思想》二篇同前十四篇收在一起，但又考虑到，它们都记录了过去年代里我的思想的脚印，也就不妨被放进去。

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担负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一般讲来任务是比较重的，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师资力量不够雄厚的地方院校更是如此。在这里，要搞点系统的研究工作，实非易事！往往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或为任务而执笔，否则只能浅尝中辍，难以坚持。我对王船山的研究便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认真的说，我还不配算一个研究工作者。因为要写出一点有创见、有价值的东西来，必须依靠长期的积累资料和潜心钻研。这方面，过去我只是经常地想到了但却很不容易做到，在今后的年月里，我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得到较大的改变。

这回把以上拙文重加厘定，只能在文字上稍作润饰，有的标题略有变动，至于基本内容，即使有些观点同我现在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也没有时间惬意地去做修改。同时我也觉得，照它们原来的样子重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生活在岳麓山脚下，从读书时算起，已将近四十个春秋了。这里虽地处江南，但春寒袭人，炎夏酷热，蒸逼难受，只有在“枫叶红似二月花”的季节，气候颇为宜人。那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大地呈现出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动人场景，也恰恰是我从教学缝隙中搞点科研的适宜时机。“红叶”，正表示了以上拙文写作的地点和时间，也就不妨把它借来做个书名。

这十六篇文字，上起1957年，下迄1987年。在这三十年间，国内政治风云几经变幻，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日积月累，特别是由于我的学浅识寡，文章的疏漏和错误，自是不少，我诚挚地企求读者指正。

1987年12月于长沙

目 录

序言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陷…………… (1)

为中国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读《李大钊史学论集》…………… (25)

邓中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 (36)

论黄爱、庞人铨革命思想的发展…………… (6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斗争路线…………… (77)

1933年湘赣边区的查田运动…………… (96)

中国苏维埃经济建设工作述略…………… (109)

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122)

阶级、党和领袖…………… (142)

“平江惨案”与反顽策略思想的形成…………… (152)

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若干观点剖析…………… (164)

社会主义胜利与生产力的发展

——学习“八大”重要文献的一点体会…………… (186)

略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中的一个问题.....(201)

刘少奇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读《刘少奇选集》上卷《关于新中国的济经建设
方针》.....(212)

王船山论知与行.....(225)

论王船山的政治革新思想

——读《读通鉴论》札记.....(241)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陷

“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五四时期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公开激烈的战斗。斗争完全表明，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是一名英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陈毅同志曾以“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的诗句来颂扬李大钊，实际上反映了党和人民对他最公正的评价。

可是“四人帮”为了要把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竟然污蔑这次“问题与主义”论战是所谓“资产阶级内部的争论”，他当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论文，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来欢迎十月革命的”，甚至影射攻击李大钊批判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文章，“不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且继续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等等。这一派别有用心的胡言乱语，怎能掩盖得住历史昭昭、真理煌煌的客观存在呢？

“问题与主义”论战，实际上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

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这次论战延续一年多的时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

在中国，李大钊所以成为第一个反对实用主义思潮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绝不是偶然的。

十月革命以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了先进思想界的主流。当时，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曾信仰过进化论。例如，他曾认为过去世界的历史，“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①但是，李大钊又不同于一般激进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还具有某些特点：（一）他对于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已觉察到弊病：“余诚不知以心灵理性超绝万类自夸之人类，视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何几耶？”并由于这个学说“本身之不完”，

“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②。可见他对于此说仍有保留。（二）如果说一般激进民主主义者，只是以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作为奋斗的指针，但却傲视一切，看不起劳动群众；而李大钊有所不同，他不仅毫无利己主义，始终坚持为民族的进步和解放而斗争，并深刻地同情劳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他说：“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③对于当时袁世凯“屈从”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愤慨地指出：“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

①②③《李大钊选集》71—72、84—85、39页。

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于未死以前。”^①只要敢于战斗，“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②因而在举国一片哀愤声中，他充满了胜利斗争的信心。（三）着眼于现实的革命活动。面对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篡权复辟的黑暗岁月，曾经参加革命和追寻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些人动摇变节，投机钻营；一些人消极颓废，乃至出家、自尽；一些人出国留学，谋求个人出路；一些人虽坚持下来，却在徬徨苦闷；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即取消了现实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振臂高呼：“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我们不能回顾“过去”，不能企望“将来”，也不能优游“现在”，而需“宜善用‘今’”。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我们必须根除“厌‘今’”这个“人类的通性”，勇敢投入现实的革命斗争，“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③

（四）在思想方法上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在《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李大钊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是异常明显的。例如他认为“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是宇宙变化的普遍规律。他号召青年“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创造一个“青春中华。”^④由于李大钊的思想上具有以上一些特点，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就能更加迅速地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条件，就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当时正在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先进分子，送

①②《李大钊选集》27、24页。

③同上93、95、96页。

④同上67、72页。

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论文的发表，正是代表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也是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从今天看来，尽管这些文章还有未必精当之处，然而，他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欢迎十月革命的，并且做了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最初尝试。

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同当时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公理”的胜利，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不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政权全归激进社会党之手。”^①“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②因此，这种革命完全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和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相比，“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国革命“根于国家主义”，而俄国革命“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③。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因而这种革命的功业乃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⑤。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不仅最早地联系十月革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

①②③④⑤《李大钊选集》101、115、102、117、113页。

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观点。

首先，在革命的对象、任务问题上。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也和一般民主主义者一样，只意识到中国长期贫困、落后、停滞的罪恶根源在于“君主专制”，而对站在“君主专制”后面的那个敌人——帝国主义，则是认识不清的。例如，他曾以为一些“官僚政治”的国家，如日本就是向外国侵略的。而一些“民主政治”的国家，如美国就不会侵略。因而在他斥责日本的“极东门罗主义”的同时，却又赞扬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都想利用战争来夺取世界霸权，他们打仗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结果取得胜利的，“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①，是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警告那高兴得发狂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指出：“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②特别是在“五四”风暴到来的前后，李大钊不断指出，日本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绝“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③，“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并且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④应该说，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述

①《李大钊选集》110、109页。

②同上113页。

③同上123、127页。

④同上212、214页。

问题，这种对帝国主义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促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其次，在革命的动力问题上，李大钊由同情人民已发展到依靠人民的明确观点。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引起的世界革命的风暴中，清楚地看到了工农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在这股革命潮流面前，就“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①。工农群众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革命威力？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多数，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李大钊所写的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的短文，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封建包工的三层压迫，工人“尚不如骡马”^②。他谈到农民的生活时，认定“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他还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严重意义，指出：“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农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对于劳动妇女解放的问题，坚持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认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④。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不仅“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而且“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女人对于男子要求解放”，“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现

①②《李大钊选集》117、154页。

③同上147、16页。

④同上145页。

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引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①。

在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怎么办？李大钊认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目的是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②，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③。

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前途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李大钊认为，十九世纪法国式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这种“俄罗斯式的革命”洪流，将要席卷全球。“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却“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④。只有通过这种革命，才能把“多少个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⑤。他热烈欢呼中国已经受到这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在这人类长眠的黑夜中升起了一颗闪闪的明星，中国人民必须乘着这一线光明去打碎那旧世界的锁链，为创造人类新生活而斗争。这铿锵的语言，对五四运动不能不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更明确地指出：

“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⑥这就把由五四开始的中国革命，看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作为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也就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了。

①②③④⑤⑥《李大钊选集》130、146、233—234、117—118、121、255页。

可见，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李大钊所写的主要论文，不仅最早地宣传了马列主义，而且已着手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工作。当时虽然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如社会性质、革命步骤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对于革命的另一一些基本问题，如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问题，却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虽然还没有（这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但却孕育着这条总路线的一些基本观点的幼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必然得到不断的完善）；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但却基本上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而且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阵营中的杰出代表，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他是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战旗，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潮流前进的一名伟大旗手。这样，也就引起了一切马克思主义敌人首先是实用主义者的非难和挑衅，便不足为奇了。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由几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主张科学、民主和文学改革的文化统一战线的运动。十月革命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传播时，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就有了本质不同的因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逐渐感到不安，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没有带上广泛的群众性，因此他们暂时还未公开站到敌人方面去，然而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在提倡“文学改良”时，胡适还只是间接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那末，当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时，他就

迫不及待地写了《不朽——我的宗教》，随即又刊布《实验主义》，公开揭起了实用主义的破旗，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样，就揭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序幕。

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胡适把个人叫做“小我”，把全人类社会称为“大我”。社会这个“大我”是由无数个人这个“小我”活动的连续和堆积所造成，即个人造成历史、造成社会。“大我”不死、不朽，“小我”有死，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言行，都一一留在那个“大我”之中，随着“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胡适说，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便是“我的宗教的教旨”，也就“是我的宗教”①。

在这里，胡适把他的社会学观点同宗教迷信联系起来，向信仰主义乞灵，不是偶然的。因为实用主义是和信仰主义分不开的。它既然否认客观真理，坚持主观真理，又认为这种主观真理，根源于自己的信仰，所以必然走上信仰主义。詹姆士就说过：“如果神学观念于具体的生活能有价值，它在实用主义上就是真的，就真到这个限度。”②胡适把“社会不朽”论推向神学还因为当时是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宗教和神权宗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信仰的传统又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他想趁着这个有利的时机来推行一种新式宗教、新的迷信，也就更容易俘虏人。

但是，他的“社会不朽”论的主要矛头，又是对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神学理论涂上一层“科学”的油彩，用神学冒充科学来进攻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宣称“社会不朽”论是达尔文科学进化论的产物，而且公然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把李大钊早期进化论的恩惠引来为自己

①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载《胡适文存》卷4。

②詹姆士：《实用主义》中译本，商务版第80页。

辩护，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对李大钊的尊重，实际上则是用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

这样，李大钊就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文，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如前所述，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于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就已感到怀疑；而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便对这种理论作了大胆的否定。他说，“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这完全是出于剥削阶级的需要，是帝国主义“扩张领土”的需要，是一些民族“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的需要，人类社会“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此，大家才晓得这个学说是“大错的”^①。这就从原则上指出了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的错误，也就把胡适的“社会不朽”论的“科学”外衣脱了下来。

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不朽”论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尖锐对立的。

首先，这种理论完全抹煞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极端夸大偶然性的作用。胡适认为社会单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古往今来的无数个人的交互影响，造出了历史，这种社会历史的基础是个人，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的基础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李大钊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的政治、法制、伦理、哲学等等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动引起基础构造的变动。所以说它是“最高动因”，因为“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

^①《李大钊选集》120页。